

章诒和、贺卫方《四手联弹》被删改部分

一国两版，情何以堪？

文/见色起义

（一）

当我敲下这一小标题时，觉得有些没劲的，虽也一肚子的感慨。以前做一个普通读者时，每每校对足本与洁本，就恨得咬牙切齿，真想痛骂暴扁那些审查官、决策者们。同时，我也觉得某些时候责编实在过于谨慎，需要承认一定的责任。

后来，渐渐理解，这年头都不好混，“大手”在那，不高兴了，一个电话、一纸禁令，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做出版的也只能谨慎再谨慎。当年岳麓书社出版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结果怎样？被打压得缓不过劲来；笑蜀出版《历史的先声》，据说泄露了我党秘密，结果丢了饭碗，我的地盘我做主，给我卷铺子滚蛋。

前段时间看杨葵《过得去》，其中有一故事是说当年出版《尘劫》，删除数十处，四万余字。终还是触犯禁忌，被令停止发行，并汇报出版情况。接下来长达半个月时间，杨葵反复写检查。“其实《尘劫》并无反党反社会主义内容，只从个人角度，讲些无甚大碍的陈年旧事。即使如此，编稿子时还是提着十二分小心，不放过任何一处可能敏感的字句。”

诚如杨葵所说，做图书编辑的多像戴着镣铐跳舞（尤其是涉及现当代政治和历史的作品）。禁忌的年代，说真话，说良心话，是要付出代价的。在我进入出版领域后，我开始理解了一个编辑的难处，一个出版社的难处。有点追求的，有点责任的，谁他妈想删改作品啊？为了所谓“敏感”作品，审查官们逐字审查，可能只差拿放大镜了吧。一边，振兴出版业的口号，喊得老响；另一边，不开放书号，权力之手乱伸乱摸。真是扯淡至极。

也因此，我能理解广师大的难处，章诒和与贺卫方本身是“敏感人物”，出版《四手联弹》的压力可想而知。在这里，我也许下一个小小的心愿：只要我知道某本作品内地版是“阉割本”，哪怕已出港台版，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购买，尤其是那些有追求的出版社，只因你们戴着镣铐跳舞。

（二）

章诒和在大陆出版的《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接连遭禁，抛开其独特的风格外，两部作品影响甚广，实有得益于“禁书效应”。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在大陆出版时，内容由两册缩成一册，贺卫方写了一文《肢解名著，情何以堪？》（网络上也有以《一国两版》转载）。

2010年4月，贺卫方与章诒和的合著《四手联弹》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大陆语境的问题，出版社也不得不做删改，虽谈不上“肢解”，书的整体“灵魂”也还在，但其中的删改，毕竟或多或少遮掩和曲解了原意，无法不令人感慨。

以下举几点，以窥当下言论自由状况。

1. 为领导者讳

1957 年夏季，报纸上登出父亲的言论。其中有这样一条：“还是半部《论语》治天下。”（广师大版，P184，章诒和《学<论语>，说孔子》）

一九五七年夏季，报纸上登出父亲的反动言论。其中有这样一条：“毛泽东还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牛津大学版，P170）

不久，朱德另住去了。（广师大版，P115，章诒和《我看到了洪堡大学》）

不久，朱德有了德国女友，另住去了。（牛津大学版，P102）

[大陆直连看禁书禁闻禁文禁网禁片禁歌禁曲](#)

2. 陈寅恪的眼角不能流泪

陈公晚年，遭遇浩劫，工资停发，存款冻结，他所住的中大寓所——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临终前，他的眼角不断流泪，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广师大版，P227，贺卫方《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陈公晚年，遭遇浩劫，工资停发，存款冻结，他所住的中大寓所——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四周架上高音喇叭，昼夜不休歇，轮番广播批判他的文章。后全家被赶到四面透风的平房，直到折磨致死。临终前，他的眼角不断流泪，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牛津大学版，P239）

3. 书名都不让提

“章老师，我知道你，读过你的书，多好的书哦！”（广师大版，P230，章诒和《陈姑娘，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章老师，我知道你，读过《往事并不如烟》，多好的书哦！”吃惊不小，一个流行歌手能读罗隆基，看史良，琢磨储安平。（牛津大学版，P243）

2006 年，我送了本新著给陈琳。（广师大版，P234）

二〇〇六年，我送给陈琳刚出版的《伶人往事》。（牛津大学版，P247）

4. 张爱玲不能比丁玲有味道

我所熟悉的学者孙郁写民国人物“狂士”的文章，一篇连一篇，一本接一本。为什么要写这些旧人？他说：因为他们更耐人寻味！（广师大版，P266，章诒和《他们更耐人寻味》）

我所熟悉的学者孙郁写民国人物“狂士”的文章，一篇连一篇，一本接一本。为什么要写这些旧人？他说：因为他们更耐人寻味！的确如此，张爱玲就比丁玲有着更多的“味道”。（牛津大学版，P279-281）

不再具体论述《四手联弹》被删改的情况（包括未收录广师版的五篇文章），附录于文后，有心者看了自我了解。

广师大版章诒和、贺卫方《四手联弹》被删改部分

篇目	广师大版	牛津大学版
也苍郁，也清冽	他答：那我以后，要用好一点的相机了，拍些够水准的。我不知道什么叫水准，喜欢就行。P16	他答：那我以后，要用好一点的相机了，拍些够水准的。我不知道什么叫水准，喜欢就行。 年底，拙作《这样事和谁细讲》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同时推出。时报版的封面、封底就是小贺的“天山叠雪”。林总编辑事先把图片发送过来，征求意见。当时，我的直观感受就不错，山色，雪色，天色浑然一色，也苍郁，也清冽。 样书到了，给小贺看。他很高兴，我说：“以后，我再出书，还拿你做封面。”P5
黑夹白 章诒和、贺卫方	什么叫天才？天才就是不正常的人。连这点起码的道理都不懂，还能有天才吗？即使有了，也会把他掐死，闷死，骂死。P27	什么叫天才？天才就是不正常的人。连这点起码的道理都不懂，我们的国家还能有天才吗？即使有了，也会把他掐死，闷死，骂死。P16

	名人无法做到完美无缺，媒体也只能是这种不完美状况的一面镜子。P29	名人无法做到完美无缺，媒体也只能是这种不完美状况的一面镜子。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早就说过，给新闻以自由是极端的民主，而限制这种自由便会迅速地滑入极端的屈从。本以为两者之间会有漫长的路途，殊不知连歇脚片刻的方寸之地都找不到。于是，结论只能是，“为了能够享受出版自由提供的莫大好处，必须忍受它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痛苦。想得到好处而又要逃避痛苦，这是国家患病时常有的幻想之一。” P20
告别喀什	我和小贺去喀什，已是 8 月下旬。一路行来，彼此的话都不多，抓紧时间看，抓紧时间走。P58	我和小贺去喀什，已是八月下旬。经过“七·一五”事件，这里变得萧条而又冷清。不幸的社会事件给我们的告别，提供了一种沉郁、哀伤情调和特殊的背景。若不从政治因素去考虑，这种沉郁之美、哀伤之情倒是颇具诗意的。一路行来，彼此的话都不多，抓紧时间看，抓紧时间走。P44-45
	不管老居民是否被保留，中世纪伊斯兰社会的风貌和遗存尽管依稀可辨，其实远了，远了。P62	不管老居民是否被保留，中世纪伊斯兰社会的风貌和遗存尽管依稀可辨，其实远了，远了。 已故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晚年见到李约瑟。李约瑟问：“你最近一次去中国是哪一年？” 答：“一九二八年。” “为什么近几十年都没有去中国看看？” 高本汉沉默片刻，仿佛自语般地说：“我更喜欢古典的中国。” 我也如此。新喀什很好，但我更喜欢老喀什。 P50

别人都朽了，他不朽	我写的老故事，为什么被误解？我又去请教歌德。在他和一个朋友的交谈记录中，我明白了：“无论哪一个人，本来只从自己的缺点中看出自己的特色，而读者感兴趣的是有缺点但富于个性的作品。”顿时豁然开朗：写作是有缺点的、有个性的。原来我的缺点就是我的个性——当我从内心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便不再苦恼、烦躁。P97	我写多少故事，就挨多少咒骂，从史良到冯亦代。自己为什么被误解？什么“怨妇”、“妖人”，什么“话题女王”，要多难听，有多难听。很苦恼，很伤感。我又去请教歌德。在他和一个朋友的交谈记录中，我明白了：“无论哪一个人，本来只从自己的缺点中看出自己的特色，而读者感兴趣的是有缺点但富于个性的作品。”顿时豁然开朗：写作是有缺点的、有个性的。原来我的缺点就是我的个性——当我从内心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便不再苦恼、烦躁。骂去吧，告去吧，哪怕我永远被诅咒，永远以失败告终。谁让“我们正在经历敌视人类的时期”（歌德语）呢。P84-85
没有塑像的底座	文中，小贺与日本朋友的问答及思考，让我联想到很多。天下事，怪怪地！P102	文中，小贺与日本朋友的问答及思考，让我联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是政治家？我们有政治家吗？ 在我记忆力，中国当代是没有政治家这一提法的。如果是执政党领导人去世，我们的新闻报道一律称：“伟大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假如是党外人物去世，我们的新闻报道一律称：“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社会活动家。” 日本国会大厅有政治家塑像，那是在正确位置上的正确摆放。我们是一个最讲政治的国家了，咋就没有政治家呢？ 天下事，怪怪地！P90-91
我看到了洪堡大学	不久，朱德另住去了。P115	不久，朱德有了德国女友，另住去了。P102

<p>建筑的政治学</p> <p>贺卫方</p>	<p>虽然萨迪奇在中文版序言里，提到他一九九二年对北京的访问。不过，他并没有对于中国古今的建筑与权力关系作出论述。P121</p>	<p>虽然萨迪奇在中文版序言里，提到他一九九二年对北京的访问。不过，他并没有对于中国古今的建筑与权力关系作出论述。记得基辛格在回忆录里提到过人民大会堂，他的评价仿佛是庞大而丑陋。那是否因为他第一次来华访问也在这里感受到某种羞辱？假如有适合的作者写一下社会主义与建筑之间的关系，或许也会是一本很精彩的书。前次访问柏林，柏林墙刚拆除不久，东柏林作为东德首都的格局还没有变化，那里的中心广场的格局也是一边是大会堂；另一边相对的是博物馆，上首是领导人的检阅台，跟我们这里的格局真是何其相似乃尔。P108—109</p>
<p>坂东玉三郎</p>	<p>我们的学校是在培养听话的孩子，艺术学校则是在批量生产演员。出了学校到了剧院，演员的艺术再好，哪怕封你为表演艺术家，你也不是中心，身边更无智者和高级专业人士为你编制，专为你谱曲，专为你制衣，专为你筹划。剧院的目标根本就不是为了艺术，而是为了其他目的。要知道获奖很容易，而“三年出个状元，十年出不了一个唱戏的”啊。P147</p>	<p>我们的学校是在培养听话的孩子，是在搞取消个性的训话教育。艺术学校则是在“批量生产”演员。出了学校到了剧院，演员的艺术再好，哪怕封你为“表演艺术家”，你也不是中心。中心是各级领导，身边更无智者和高级专业人士为你编制，专为你谱曲，专为你制衣，专为你筹划。剧院的目标根本就不是为了艺术，而是为了获奖，特别是政府奖。似乎我们的艺术体制，总是在和艺术规律对着干。要知道获奖很容易，而“三年出个状元，十年出不了一个唱戏的”啊。P134-135</p>
<p>他们像传说一样过去了</p>	<p>我算啥？一个写故事的老妇。 P172</p>	<p>我算啥？一个写故事的老妇。所写文字皆被查禁，我只能覆盖自己。P160</p>
	<p>2007 年春，我与先勇兄重逢在香港城市大学。他握着我</p>	<p>《伶人往事》一书被禁，二〇〇七年春，我与先勇兄重逢</p>

	的手，连声道：“向你致敬。” P175	在香港城市大学。他握着我的手，连声道：“向你致敬。” P161
学《论语》，说孔子	1957 年夏季，报纸上登出父亲的言论。其中有这样一条：“还是半部《论语》治天下。” P184	一九五七年夏季，报纸上登出父亲的反动言论。其中有这样一条：“毛泽东还是半部《论语》治天下。” P170
	一头撞进父亲的书房，大叫：“爸爸，我读《论语》啦！新发的课本里有《论语》，那他们为什么批判你讲的‘半部《论语》治天下’？” P186	一头撞进父亲的书房，大叫：“爸爸，我读《论语》啦！新发的课本里有《论语》，那他们为什么批判你讲的‘半部《论语》治天下’是反动言论呢？” P171
	我发配到荒野，站在山之巅，我们这些女犯的劳动任务是把半人多高的荆棘、茅草，统统斩尽砍光。 P186	我发配到荒野，站在山之巅，我们这些女囚的劳动任务是把半人多高的荆棘、茅草，统统斩尽砍光。 P173
	我双手合拢，仰望上苍，恳求天堂的父亲保佑我，不致倒下。 P187	我双手合拢，仰望上苍，恳求天堂的父亲保佑我——保佑身处地狱的女儿，不致倒下。 P173
很后悔，没为他写过一个字	2006 年秋，台湾时报的朋友带给我一本书，书名叫《宫前町九十番地》，很别致。 P196	二〇〇六年秋天，台湾中国时报的朋友带给我一本书，书名叫《宫前町九十番地》，很别致。 P182
	台湾时报的朋友知道我很喜欢这本书 P201	台湾中国时报的朋友知道我很喜欢这本书 P187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贺卫方	陈公晚年，遭遇浩劫，工资停发，存款冻结，他所住的中大寓所——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临终前，他的眼角不断流泪，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P227	陈公晚年，遭遇浩劫，工资停发，存款冻结，他所住的中大寓所——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四周架上高音喇叭，昼夜不休歇，轮番广播批判他的文章。后全家被赶到四面透风的平房，直到折磨致死。临终前，他的眼角不断流泪，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P239
陈姑娘，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章老师，我知道你，读过你的书，多好的书哦！” 吃惊不小，一个流行歌手。 P230	“章老师，我知道你，读过《往事并不如烟》，多好的书哦！” 吃惊不小，一个流行歌手能读罗隆基，看史良，琢磨储安平。 P243
	2006 年，我送了本新著给陈	二〇〇六年，我送给陈琳刚

	琳。P234	出版的《伶人往事》。P247
好吃勤做	实践的结果：写字穿衣姑且不论，要命的问题是我一直不会讲话，最终导致了此后的命运。P252	实践的结果：写字穿衣姑且不论，要命的问题是我一直不会讲话，最终导致了因言获罪的命运。P264
他们更耐人寻味	我所熟悉的学者孙郁写民国人物“狂士”的文章，一篇连一篇，一本接一本。为什么要写这些旧人？他说：因为他们更耐人寻味！P266	我所熟悉的学者孙郁写民国人物“狂士”的文章，一篇连一篇，一本接一本。为什么要写这些旧人？他说：因为他们更耐人寻味！的确如此，张爱玲就比丁玲有着更多的“味道”。P279-281
	那时我们国家的高层行政领导，也有例外，比如彭真。他担任北京市市长，中共北京第一书记。他全部工作的业绩，我不清楚。但对北京的几个京剧名角，的确非常爱护。1958年“大跃进”，所有演员无一例外下到郊区干农活。P268	那时我们国家的高层行政领导，也有例外，比如彭真。他担任北京市市长，中共北京第一书记。他全部工作的业绩，我不清楚。但对北京的几个京剧名角，的确非常爱护，且网开一面，批准北京京剧团的几大头牌，如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可以继续“抽”，但严格控制。据我所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著名京剧演员关肃霜从云南来北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烟瘾”发作，弄得大会工作人员惊骇不已，手足无措。身为委员长的彭真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刻叫人拿着他的特批条子，到北京医院领取一支杜冷丁。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所有演员无一例外下到郊区干农活。P281
	老实讲，当年彭真对文艺，对文人、艺人的了解比我们现在的文化部门深刻得多。P269	老实讲，当年彭真对文艺，对文人、艺人的了解比我们现在的文化宣传部门的领导干部深刻得多，其政策水平也高得多。P283
	艺术若跌入低谷，我以为首先是人文气息、艺术气息的丧失，是文学家、艺术家身	一个国家的艺术若跌入低谷，我以为首先是人文气息，艺术气息的丧失，是文学家、

	上散发的随意、温润、自然、悠然、超然的文化状态的丧失。P269	艺术家身上散发的随意，温润，自然，悠然，超然的文化状态的丧失。P283
--	---------------------------------	-------------------------------------

按：

1. 广师大版缺《历史是有声音的》《先天禀赋，后天学养》《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附《双照楼诗词稿补遗》）《遂了功名遂风情》《钱锺书之“阅世”》。
2. 所列篇目，在其下标出贺卫方，说明遭到删改的是贺卫方的文字；章诒和、贺卫方均标出的，说明两人的文字均遭删改；未标出作者的，皆为章诒和的文字。
3. 《南方周末》曾发表（2009年11月19日）章诒和的《陈姑娘，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被广师大删改的两处，均保留原话。

补：广师大版未收录的五篇文章

历史是有声音的

章：

二〇〇九年度香港国际书展，按照惯例要在7月下旬举办。承办单位邀请与会，因无新书出版又值盛夏季节，我推辞了。并说，明年我有书，会去的。也不怕热了。

没多久，承办单位又来函。说：人不来，写两句感言或寄语，总可以吧？限定在五百字内。

我写了，如下——

几年前，有记者问：「你喜欢香港吗。」

答：「喜欢。」

「为什么，能说说吗？」

「因为一九四九年前，我生活在香港；因为父母几次政治流亡，都落脚在香港。」

现在若有记者问同样的问题，我会说：依然喜欢香港。追问原因的话，我会加上一条理由：因为想看的书，不少是在香港出版或是在香港购买的。这里的朋友碰面时，一个最重要的话题就是打听：最近有啥好书？

二〇〇六年，大家抢着看吴法宪的回忆录，一致认为书里面有「干货」，谁也不问那封面人物到底是将军还是罪犯。二〇〇七年，大家议论何方的自述（《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阅读者无不佩服作者的独到眼光和判断力。二〇〇八年，大家边哭边读杨继绳的《墓碑》，感谢他把掩埋了五十年的「前世」尸骨用文字再现于「今生」。二〇〇九年，大家则期盼着听到一个国家囚徒的声音……

香港是汉语图书的最大集众地，一城覆盖全球。白先勇笔下的故事——从遭遇放逐的台北人（《台北人》）到夹缝生存的纽约客（《纽约客》），大半是由台湾出炉，经香港传递于八方。最近，有幸托朋友在香港搜集到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我把书摆放在床头。读它，就等于读中国当代史了。有歌有泣，可歌可泣。

历史是有声音的，这声音并不来自喋喋不休的会议或日夜喧嚣的电视。

先天禀赋，后天学养

章：

我第一次读唐德刚的书，是删节版《晚清七十年》（湖南岳麓书社出版）。几页读下来，激动得难以克制。毫不过分地说，就像遭遇八级地震，全身血脉如翻江倒海，连续几天冲动得不能睡下。别样的见地，别样的叙述，别样的文风，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我又去书店买了几本，分送朋友。他们和我一样，都惊了，也都快疯了，其冲击力与原子弹爆炸没什么两样。唐德刚提出的「历史三峡」论如池塘涟漪，一波一波推得越来越远。至今每与朋友众会，唐氏关于时代变迁的主题，是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联系到眼下的社会现象，也越发地引人深思。有人形容他是「二人敌一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并不夸张。

唐德刚的作品还原了历史，这个历史包括了人和事件，还有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时代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即内心）的关系。人物是真实的，环境是实在的，时代是准确的，内心是可视的。他的语言是个人化的，充满文学的魅力，也充满了真知灼见。他说（张）大千之作是「宋元之下，明清之上」的，是略带「现代新意」的「传统国画」，基本上和梅兰芳的京戏一样，都是「传统艺术」的「收山大师」。这话，即使专搞艺术研究的人，恐怕未必能概括的这样好。

唐德刚的一篇《梅兰芳传稿》，我都翻烂了。后来，方知竟是人家的处女作，况且还不认识梅兰芳，怎么写得这么好？神了！从此，我把唐德刚确立为自己终生效仿的楷模、学习的榜样。学不好，也要学。于是，在动笔前和写作过程中，我开始比较注意研究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内心之间的关系了。比如写翦伯赞，就要好好想想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翦伯赞还能化解政治需要和学术良心之间的矛盾，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他受不了了，毕竟是读了些书的。翦伯赞是主张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但他不能容忍教育如此低级地伺候于政治；翦伯赞是主张学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但他不能容忍学术如此卑贱地跪拜于权力。对于那时的教育革命和史学革命的种种做法，他有投入，有参与，有调适，但也有不满，有抵制，有排拒。其思想冲突非常激烈，内心变化也十分复杂。毕竟政治难以取代常识，环境无法窒息心灵。可以说「文革」前夕的翦伯赞，思想上有了极其明显的转折。对吴晗也是需要审慎研究之后，方能下笔的。他以学术起家，未以学术为业；他成于政治，又死于政治。但我以为吴晗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政治范畴。他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符咒，是对中国的学术和学者的一个戒语。吴晗的不幸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更是时代的不幸，民族的不幸。千年遗传下来的根性，使很多文人、知识分子对权势抱有敬畏，也怀有期待，期待自己也能进入权势。关于人与内心的关系，主要指心态、心理、心绪、心情等。罗隆基一生，身边的女人没中断过，即使成为右派也如此。反右运动结束没几年，就有漂亮年轻的女性表示愿意嫁他。罗隆基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就一直独身，但一直背着「流氓」的骂名。拙作《无家可归——罗隆基情感世界》，我有意集中笔墨来写他的情感世界，以其日记、年谱为依凭，把他从小到老的私生活做了梳理。我有意识地涉及他的性心理，从形成到表现都做了点滴分析或归纳。也许说对了，也许错了，但我觉得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

别以为「口述历史」就是「你说我记」，口述史的优劣与高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访者，取决于他的史学知识，社会积累和考证功夫。唐德刚一方面善于提问，逼出传主「说出一切」，另一方面，他能发现和纠正传主的记忆疏漏，加以考证和补充。众所周知，他给胡适写口述史，胡的口述部份占一半左右，另一半内容则靠他找到相关材料加以充实。（《李宗仁回忆录》属于传主本人的口述仅占百分之十五）。拿《胡适口述自传》与此前的《四十

自述》对照，正如唐氏所言胡氏「并未提出什么新材料」，但是，唐德刚的注释确为不可不读的好文章！难怪台湾学界认为，就学术意义和史料价值而言，注释部份恐怕还在传文之上，说「先看德刚，后看胡适」，并不过份，也非过誉。

读唐德刚的作品常常是拿起就放不下，其原因还在于他的一支笔，能把历史写得非常好看，即用文学来写历史。史书有无价值，在于史料的真实；史书能否流传，则在于文学的功力。唐德刚曾这样讲：「胡适用十多年时间研究《水经注》，计算机十几秒就出来了……但是，我们史学研究还有一部份可以与科技相对抗的，那就是在史学之中，还有文学。」实践证明，他是对的。

有人说唐德刚的路子有点野。野，是指他研究和表述历史不够严格、也不够够正统。的确，不够严格，不够正统。因为在他笔下，不但「文史不分」，且性情张扬。需要说明的是唐德刚的张扬，决非肆意妄为，而是源于其毕生对历史的亲历和对社会的感受，风潇潇，血淋淋！有了亲历和感受，就自有言说的欲望和冲动。阅尽天下炎凉，历遍世道沧桑，唐德刚是最懂人心与人情的！一落笔，人物就有血色，时间自会倒流。那些远去的灵魂，遗忘的历史，都被他的笔扫到了眼前，格外生动，也格外分明。读他的《梅兰芳传稿》，你能感受到浓浓的哀婉之情和淡淡的旧日梦痕。那既是梅兰芳的内在气质，也是唐德刚的海外孤魂！洋洋洒洒的文字背后是一个人的情怀！

据说，在离别二十五载之后，一九七二年他首次归来。当从飞机舷窗眺望到家乡山水时，激动不已的唐德刚，躲进洗手间，失声痛哭。

「临去且行且止，回头难收难拾」。这是他的诗，也是他的心。

贺：

唐德刚先生的著作，我接触得倒是比愚姐早。大约是在一九八三年，一位朋友送了我两册装帧相当简朴的书，一本是胡适的哲学文章选编，另一本就是《胡适的自传》。出版者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年份是一九八一年。那时大陆这边对于胡适的评价尚处在「乍暖还寒」的时刻，因此两本书都标注着「内部发行」的字样。所谓「内部发行」大抵接近于禁书，也有跟明令查禁一样的某种反向激励作用。古人说人生几大乐趣里，即有「雪夜闭门读禁书」。约翰逊博士引用白洛拜医生（Dr. Barrowby）的话，「吃猪肉的时候，我恨不得自己是一个犹太人。」别人问：「何以如此？」白医生说：「犹太教禁食猪肉，因此偷吃之中自有一种犯罪的快感。」

初读，就被唐德刚文章风格给迷住了。《胡适的自传》是口述历史，本来，唐德刚的角色只是一个提问和记录者。但是，成书之后的这部自传，传主的风头几乎全被记录者所加的注释给抢走了。那些注释文字几乎颠覆了标注文献或简要延伸议论的一般注释传统；它们或者是一篇小品文，或者是一则细致入微的考据，或者简直就是一篇小论文。例如第五章注释对于胡适学位问题的长达五页的考证和议论，第六章里对于「县」的本来意义是「悬而未决」而非「县县于郡」的讨论洋洋洒洒四页有余，第八章注释对于白话文与文言文关系的连续三五个注文，都是有思想、有创见、有材料的好文章。

我是学法律的，按说离唐德刚先生的历史学较远，不过他的著作却给我多方面的启迪。不妨举一个例。一九八〇年代后期，自己对于中国与西方在司法制度方面的差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个突出的差异是在司法决策时逻辑的运用。从古希腊开始，西方的司法就一直讲求严格地遵循三段论推理。但是，检讨我国的古典司法，判决书的写作往往置逻辑规则于不顾，含义模糊的「天理」、「人情」常成为判决依据，这当然会导致司法的高度随意性，根本无法确立法律规则的确定性。其间原因何在？在《胡适的自传》第五章的一个注释里，唐德刚单刀直入，把逻辑学在中国历史上的早夭归因于我们法庭的不讲逻辑：

「法律」是最讲逻辑的。因而个个律师都是逻辑专家；而律师在西方社会里的地位——

从古希腊罗马到今日的英美法苏——那还了得！可是我们传统中国人（古印度人也是一样）最瞧不起所谓「写蓝格子」的「绍兴师爷」和「狗头讼师」。我们的「仲尼之徒」一向是注重「为政以德」的。毫无法理常识的「青天大老爷」动不动就来他个「五经断狱」，断得好的，则天理、国法、人情、良心俱在其中；断得不好的，则来他个「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满口的革命大道理，事实上则连最起码的逻辑也没有了。西方就适得其反了。西方的律师，诉讼起来，管他娘天理、人情、良心，只要逻辑不差，在国法上自有「胜诉」。因而他们的逻辑，也就愈发展愈细密了。

这是发人深省的论说。我在所写文章的注释里，曾援引这段注文，以增强说服力。此后，自己不断地进行阅读和思考。例如，我们的「青天大老爷」无视逻辑的原因又是什么？传统官方话语对逻辑的排斥跟那种诗化语言和文人习性是否息息相关？法律专业化与语言的专业化之间有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都不只是涉及历史，而且也关乎现实了。

唐德刚的文章风格是别具一格的。由于对白话文运动有着与胡适不同的评价，他偏爱那种文白夹杂的文体，加之饱览群籍，联想丰富，读之真如「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他生性诙谐，又受到大学时代重庆那独特的茶馆说书氛围的熏染。虽纸上作文，亦如坐讲席，文言俗语，绘声绘色，读之很容易产生一种亲切感。他不同意胡适「文言是半死的文字」的口号，说古人为文也是达意而生动。例如司马迁，居然把「我们安徽」的土话也写入古文。研究文学史的夏志清教授曾专门举出《胡适杂忆》里描述纽约演京剧时那些龙套演员的表演场景，以为唐德刚独树一帜的散文风格的标本：

可别小视「跑龙套」！纽约市有京剧票房五家之多。平时公演，粉墨登场，锣鼓冬仓，琴韵悠扬，也真煞有介事。可是「龙套」一出，则马脚全露。那批华洋混编的「龙套」，有的不推就不「跑」，有的推也不「跑」，有的各「跑」其「跑」，不自由，毋宁死……好不热闹！笔者在纽约看国剧，最爱「龙套」，因为他能使你笑得前仰后合，烦恼全消！

堆雪乱山，落珠玉盘。读这样妙笔生花的「德刚体」，不也可以让人「烦恼全消」么？唐德刚说胡适多姿多彩的一生「是他先天禀赋和后天学养，合二为一所铸造出来的」。我们不妨把这话看做他的夫子自道。

文风尽可灵动多彩，而唐德刚所研究的中国近代史却是相当沉重的话题。在《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等历史著作里，面对宽广而复杂的诸多问题，充溢在字里行间的许多识见，尤其卓尔不群。说到灾难深重的民族的前途，他倒是像胡适一样，有一种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所依据者，乃是他那著名的「过历史三峡」的理论：这老大国家正在经历第二次深刻的社会转型，依据第一次转型即从井田制向郡县制转变的历史经验，我们需要两百年的努力，即到二十一世纪中期才能够驶过惊涛骇浪，进入波澜不惊的现代社会。不过，这个理论也许会受到某种质疑。我有时也会怀疑——为什么历史一定如长江那样朝向一个方向前进？历史的方向会不会有更多样化的选项？

也许我们是要过三峡的，但也可能是在西于湖里荡舟，转了一个圈，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章诒和

读小学的时候，就知道中国有个大汉奸，叫汪精卫。中日战争期间，全国人民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战，唯独他投靠日本，出卖国家。蒋介石也是假抗战，真反共。那时的教科书都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宣传的。回到家中讲给父亲听，他哈哈大笑，说：“课本上写错了，老师也讲错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老师和书本怎么都错了？”我颇为惊异。

“错了。”父亲点点头，语气颇为肯定：“蒋介石反共，但他是抗日的，还是领导抗日的领袖。”

我说：“领导抗日的，不是毛主席吗？”

“那时没有毛主席，只有蒋委员长。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还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呢。这不是造谣，我在场。”

父亲的话，我听得发沐又发呆。

提及汪精卫，父亲是一讲再讲，尽管每次说的很零星。他称汪精卫为汪兆铭，说这才是他的姓名。对他的看法，父亲归纳为三点：漂亮，才情，人品。首先，汪兆铭是美男子，最美的是那带着侠气的一双眼睛。男人看着也动情，不是连胡适都说自己若是男人就一定要嫁他吗？

其次，是汪精卫的才情，写得一手好诗文。

“好到什么程度？”我问。

父亲说：“汪兆铭诗文可以选人教科书！台上是领袖，提笔是文人。”父亲多次向我背诵他狱中所作《被逮口占》：“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在决定亲赴北京行刺清朝摄政王载灃前，曾写有一封《致南洋同志书》。书中慨然道：“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人都门也。”父亲说：“那时的汪兆铭和戊戌变法的谭嗣同相比，毫不逊色，一样的壮怀激烈。”父亲又告诉我，那篇人人熟读的孙中山《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实则由汪兆铭代笔，孙中山未写一字。

说汪精卫有人品，我有些不解：“汉奸有什么人品？”

父亲说：“政治上从慷慨赴死，到涕泪登场，到客死异国，汪兆铭是一路下坡。但人品上，可以说他一辈子无可挑剔。不贪钱财，不近女色，不抽不嫖不赌。他有政治欲望，若和老蒋、老毛相比，是个没有太大政治野心的人。”

后来，我还知道了“人心思汉”的典故。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向全国派遣接收人员，大家管他们叫“劫收”大员，个个“五子登科”。所谓“五子”就是指他们所“劫收”的房子、票子、金子、车和女子。国民党的接收，弄得民怨沸腾，当时的报纸就有载有“人心思汉”之说，成语本意是想念家国，但这儿的“人心思汉”，是暗指人心思念汉奸汪精卫，思念他的人品。

我再次发呆又发怵。

父亲从书房里，拿出一本可能是香港刊印的《双照楼诗词稿》，翻到《金缕曲》一页。说：“这是汪兆铭在狱中写给陈璧君的情诗，你读读。和你学的那些散曲相比，我看也是不差的。”

汪精卫入狱后，陈璧君直奔京城设法营救，并以密函向汪示爱，原以终身相托。汪精卫看后万分感动，遂改清初顾梁汾寄吴兆骞之《金缕曲》“季子平安否”旧作而成。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

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
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
一腔血，为君剖。
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
留此余生底事，空令故人佞俄。愧戴却头颅如旧。
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绕车前后。
肠已断，歌难又。

《金缕曲》中有报国之志，亦有男女之情，都写得至纯至性，令人感动。我才明白所谓的汉奸，绝非我们印象中的白鼻梁小丑。在《金缕曲》后面，汪精卫又用血写了五个字“勿留京贾祸”，叫陈璧君赶快离京。几天后，汪收到陈璧君的一封信，信中再次向汪示好，建议“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汪精卫被陈璧君的真情打动：自己被判无期徒刑，毫无出狱的希望。即使有相见之日，彼此已为垂暮之人，遂咬破手指，用血写下一个“诺”字。陈璧君接到汪的血字，痛哭了三日。

汪精卫从政一生，诗词也伴随了一生。据说，他病重时曾表示：不要留存文章，可留的只有诗词稿。他的诗篇咏山河，哀民生，痛名节，弥漫着悲苦凄凉，萦绕着忧国情思。词学大家龙榆生称汪诗为哀国之音。学者叶嘉莹认为，汪诗中蕴涵着一个“精卫情结”，所谓“情结”，即指一个人的内心始终存有一个追求和执着的理念。汪精卫的名字缘自《山海经》“精卫填海”的典故。

他有“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的诗句。“衔石”指的就是填海的精卫鸟。一个小鸟，想衔着小石子去填那破败中国的沧海，填得了吗？出于“曲线救国”的政治路线与“主和”思想，在民族危亡时刻，汪精卫希望能保全沦陷区一部份民众和土地，他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了。为达到这个理想，他跟日本谈判。日本人把条件说得很好，一旦迈出脚步，条件马上变了。加上老蒋的打击排挤，上了船的汪兆铭无可奈何了，也永难回头了。叶嘉莹说，精卫填海填得了填不了是一回事情，我有这种理念又是一回事。汪精卫所做，正是这种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于是才有一生的“衔石成痴绝”，才有一世的“沧波万里愁”。纵观汪诗，从壮怀激烈到一腔愁苦，这个“精卫情结”贯穿了始终。

二〇〇四年，汪氏幼子文悌内弟根据旧日“民信”“泽存”“永泰”诸本细加审定并附补遗重行刊印，成为目前最完善的版本。二〇〇五年九月，在美国工作的高伐林先生，受汪氏长女文愷之夫何文杰老人之托，携若干新本酌量赠予国内历史、文艺部门以供研究。高先生拿了两册，一册给我，一册赠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

当夜捧读新本，边读边落泪。负罪人带着他的心魂走了，不知他进了天堂还是下了地狱？一往凄清，同诉飘零。无论灵魂停留于何处，我想，在夜的清幽裏，他也会显示出属于自己的魅力来。

“扫叶吞花足胜情，巨公难得此才清。”这是钱锺书的诗句。显然，他很感叹汪精卫——一个政坛人物有那么多的诗人的感情与才华！

附：双照楼诗词稿补遗

努儿哈赤墓上作墓——在沈阳城东称束陵

百年终一死，所余但枯骨。可怜秦始皇，于此致情切。
生营阿房宫，死葬骊山穴。刑徒七十万，汗尽继以血。

俊来帝王陵，侈丽如一辙。珠襦与玉匣，留与赤眉发。
凄凉冬青树，遗黎泪空咽。鞅鞅起黑水，人事至简率。
一朝得荐食，摹拟惟恐失。沈阳城之东，冈峦若屏列。
周遭四十里，松柏青郁郁。墓门与隧道，初日焕丹漆。
取材自昌平，规模信弘阔。昔日辽东战，千里血渠决。
髑髅筑京观，高于此陵埒。自从入关来，中原苦萧瑟。
扬州与嘉定，屠城辄十日。城阙尔何物，朽骨惊突兀。
丹青尔何物，血肉惨凝结。历史如我诏，悲慨肠内热。
祸阶自玄鸟，朱果孕梟杰。长林与丰草，世世作巢窟。
老汗真封狼，所至纵弛突。持校阿骨打，嗜杀差男髯。
持校铁水真，战伐逊功烈。长城适自坏，戎马不能遏。
生躯复生罗，九州竟囊括。党人起革命，危苦经百折。
所薪但平等，志事昭若揭。三户秦遂亡，九世仇已雪。
于今一家内，不复辨胡越。君看原上树，樵斧不容伐。
当春绿盈枝，行人弄清樾。山川自辉媚，云物足怡悦。
村歌杂妇孺，燕雀鸣相聒。南望黄花冈，毅魄如可活。
真成抵黄龙，痛饮不能节。

由巴黎返罗痕郊行

蛙迎归客互喧呼，无限欢声渐满糊。
几处芦根知水落，一时风雨令花疏。
好山重对逢知己，熟径追寻温旧书。
入夜谁驱幽涧月，伴人耿耿到庭除。

重九登白云山

累碁直上众峰头，回首坡坨紫翠稠。
南国鱼龙方静夜，中原鸿雁又惊秋。
名山浪作终身计，佳节聊为尽日游。
归路渐知人事近，尚闻涧水入林幽。

舟出巫峡过巫山县城俯江流山翠欲活与十二峰礪气象
迥不侔矣为作一绝句

峡开江水接天流，一抹修眉翠黛浮。
若把风姿喻神女，矜严消尽见温柔。

过巫峡

奇峰十二贯苍穹，铁骨松颜今古同。
一扫荒唐云雨梦，披襟饱领大王风。
闻之舟子三峡猿啼近来已成绝响为作一绝句

不尽人间杀伐心，老猿从此入山林。
风清日烈瞿塘峡，惟有秋蝉自在吟。

春暮

又是莺飞草长时，劫余髡柳亦成丝。
可怜春色穷妍丽，不似人间有乱离。
死未归魂虚上冢，生仍枵腹强扶犁。
幽禽枉作丁宁语，为问提壶欲劝谁。

题吴道邻绘木兰夜策图

风四号，月半吐，此时揽辔跋长路。
风与马，同萧萧。月与人，同蹢躅。
拼将热血保山河，欲凭赤手回天地。
戈可挥，剑可倚。
一千一城从此始，虽千万人吾往矣。

[大陆直连看禁书禁闻禁文禁网禁片禁歌禁曲](#)

遂了功名遂风情

贺：

来到江西安福县那天上午，细细的雨不停地下。午饭后雨过天晴，我马上跟主人提出要求，希望能够到罗隆基故居去看一下。路上，我已经看到大路迁竖立着的「罗隆基故里」的标志。陪同的朋友告诉我，王造时的家乡距离也不远，但是据说那里没有任何可看之物了。

来到村里，首先看到的是只剩下残垣断壁的罗氏祠堂，相当破败。沿着一条小路，来到了罗隆基故居。这是一座典型的江南民居，门楼上的飞檐高高翘起，很是生动。大门右侧挂着一个标牌，上面刻有「罗隆基故居」字样，并注明系安福县文物保护单位，公布的时间是二〇〇二年五月十六日。进得院门，只有两步距离差不多就进到堂屋。墙上挂了一些反映罗隆基生平的照片，例如第一次政协会议的全体合影，与沈钧儒、郭沫若等的合影。当然，也包括罗的第一、第二任妻子的照片，还有他跟浦熙修在五十年代的那张合影，以前曾经在哪本书中见过的。总的来说，故居的陈列还是非常简陋，来作解说的县博物馆的朋友说资金困难，无法更丰富。为什么困难，原因自然是众所周知的。

陪同我来访的广州大学刘志强博士既是安福县人，同时也是研究罗隆基人权思想的学者。过去几年里，他多次跟我谈起自己在研究罗隆基的人权理论过程中的一些体会。他认为，罗氏人生有「议政」和「从政」两个阶段。议政颇有建树，但从政却以悲剧而告终。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他从政的失败比他议政的成就更值得我们研究和反思。

出了故居，来到村旁，看到一幅美丽的风景。一条比通常的溪水大、但又比河小的流水从村旁款款而过，水边樟树如盖，绿竹成荫。村南是山，名曰笔架，也许这灵山秀水可以解释安福何以诞生如此多的才俊。想当年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均考入清华，又都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读政治学，并称「安福三杰」，也是一时佳话。当然，三人同遭「丁酉之灾」也可谓共患难了。

在故居里，我发了一个短信给愚姐，因为关于罗氏生平，我大多是从她的《往事并不如烟》以及《云山几盘 江流几湾》里读到的。来到这里，自然应该让她知道。她回复说有些意外，叮嘱我一定要拍些照片给她看。章：

二〇〇八年一个夏日的中午，我站在医院的大厅，神色黯然。我的甲状腺查出有肿瘤，医生说需要进一步查清是良是恶。我不知所措，立即想到地狱般的癌症病房和近乎酷刑般的治疗。我不怕死，怕病，很怕——从半夜在地上爬行十几分钟摸到电话、打「一二〇」求救的那一刻，就怕。自先生去世后，我就放出话来：活到一个界限，就自我了断。

正伤心不已，小贺发来短信：「大姐，你知道吗我正在江西福安县罗隆基的故居呢。」

霎时间，我满眼是泪！自己大半辈子的苦和罗隆基一辈子的冤，都汇聚到泪里了。

伫立良久，任熏风吹干泪水。慢慢走出医院大门，脑子才恢复了正常思维：罗隆基故居？小贺怎么先去了，这本是我该去的地方！要知道，我与民盟江西省委的朋友为修缮罗氏故居不断打报告，找关系，写文章，呼吁再三。但均无回复，更无下落。后听江西友人说，当地政府把它划入「建立新农村」计划。顶着这样一个名义，罗隆基故居获得修复。在通向故居的马路一侧，还竖立了「罗隆基故里」醒目标志。

罗隆基是从福安老宅走向清华，走向大洋彼岸，开始他的学业和事业的。无论是官居部长，还是成为右派，他都念念不忘自己的家乡。这一点，父亲和他一模一样。一九五七年后，罗隆基是我家常客。他的谈吐和风度深深吸引着我。他讲的江西老表的故事和家乡风情，常把我逗得大笑。父亲怀念老家，是因为章家人卖田又卖土，一下子把章氏三兄弟同时送往德国、法国、俄国留学。而罗隆基的乡愁，则与情有关。

今年，一个极其偶然的的机会，我有幸读到他临死前仓促编写的年谱。那里面，他坦承自己对家中二嫂的爱恋。一九〇五年三月（罗时年九岁），一个女人从罗隆基身边离去：他的母亲病逝。五月，另一个女人来到他的身边：二嫂和二哥结婚，跨进罗家大门。一九〇六年父亲续弦，十岁的罗隆基失去母爱，又失父爱。但他得到二嫂的疼爱与照料。他与她之间，有一老嫂比母」的内容，但远不止于此。一九一七年，二十一岁的他从清华毕业，返回故里。经过多年的分别，再经过叔嫂关系的浸润，年轻的罗隆基和中年的二嫂把原有的情感迅速衍化为隋爱。他在年谱里写道：「暑假时返家住一个月。在返家休假中，二嫂待我最亲，感情最好。是我在家中最有感情、最亲爱的人。」「第一次同二嫂有弟姊感情，她让我吻她。」罗隆基尊敬的对象不是父母，而是二嫂。恋嫂情结是恋母情结的演化，而恋嫂情结的延续，则使他的一生都在寻求通过女性角色激励自己成功。「唐家多少风流案，开元天宝接到今。」这个被二嫂疼爱的弟弟留美学成归来，很快成为情场的斗士、征服者，乃至产生终生的偏好。

遂了功名遂风情，风情甚于功名。无论政治成败，任它风波迭起，不管别人议论，罗隆基为情所累是不变的。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身为森林工业部部长和全国人大代表的罗隆基，以到江西视察的名义回到安福家中。是衣锦还乡，也是最后的回望。

钱锺书之「阅世」

贺：

很长时间以来，总有人对于钱锺书先生的政治态度甚至操守有些质疑，认为他面对专制政治表现得过于顺从。对此，我有些不同的看法，这里略作讨论。

其实，人的政治表现各异，主要是由于对何谓政治意见及其表现方式理解不同的结果。政治上发表意见，不必一定以直接指向的方式，而完全可能是间接的，通过引述加以表达的，以及借古讽今的。一部《管锥编》，涉及各种领域，其中包括对于钳制言论的谴责，对于民贼与贼民之间辩证关系的阐发，关于「神道设教」以及愚民者亦自愚的分析，凡此种种，都明确表达了作者对宗教政治功能的见解和对专制政治的抗议。其实，我这样的在古典文史方面缺乏修养者读《管锥编》，往往只能看出一些很直观的见解。其中引用的许多著作，自己根本闻所未闻，不能逐一查考，上下追索，也无法理解在特定的地方作这样的引用的「微言大义」。如遇高人，则心有灵犀，定会在布满引文的字里行间，悟出无比丰富的政治意蕴来！正像余英时先生在陈寅恪诗词里发现政治言说那样。实际上，已经有人通过不同的角度试图挖掘钱先生的某些表达的特殊意义。例如，李慎之和余英时先生就颇为留意钱先生一九八九年一首诗所蕴含的特殊意义。这首题为「阅世」的七律，所吟咏的是什么呢——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需要特殊解读方能理解其中深意的例子，甚至包括《围城》。按照美国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解释，这部小说实际上包含着某种政治意义，也就是说，它旨在反映一九二七年以后中国国内的政治悲剧，当然，也包含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的判断。这似乎有些「索隐派」的做派，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在判断一个像钱先生这样的文学人

（man of letters）的政治见解时，只是看文字表面是否直接议论了政治问题恐怕是远远不够的。

谢泳文集《杂书过眼录》里，一篇题为〈钱锺书与清华「间谍案」〉的文章透露了作者发现的新材料——一九五六年前高等教育部呈送中共中央一份名为《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这份报告，把钱锺书定性为「反动教授」。它包括以下诸多内容：「文学研究所钱锺书在解放前与美国间谍特务李克关系密切，和清华大学所揭发的特务沈学泉关系也密切，曾见过『蒋匪』并为之翻译《中国之命运》，还在上海美军俱乐部演讲一次。在解放后一贯地散布反苏反共和诬蔑毛主席的反动言论；一九五二年他在毛选英译委员会时，有人建议他将毛选拿回家去翻译，他说『这样肮脏的东西拿回家去，会把空气都搞脏了』。诬蔑毛选文字不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时，他说：『共产党和苏联一伙，国民党和美国一伙，一个样子没有区别』。他还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乡下饿死好多人，比日本人在时还不如』；当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材料时，他说：『胡风问题是宗派主义问题，他与周扬有矛盾，最后把胡风搞下去了』，等等反动言论。」据谢泳的看法，这份秘密报告，钱锺书本人自然不知，但是却非常能显示其人格与思想的。

若论及钱先生对于民族国家的担当，他在文学及文史研究领域中的成就是已经是光照千古了。按照约翰逊博上的说法，「卓越的智慧禀赋，才是至高无上的福祉；每一个国家的声誉，都建立在国内文学家的成就与尊严上面。」

至于政治的成败优劣，我想，还是更多地让政界以及从事攻治法律研究的学界来承担责任吧。